

书画篆刻家王丹用10年把英魂“刻”入纸上丰碑起来！以“辽西义勇军”之名

白 鹏 本报记者 吴 丹

核心提示 锦州边墙子村虎溪窑工作室的窗，正对着辽西苍茫的群山。书画篆刻家王丹从画前转过身来，指尖凝着一抹独特的赭红——那是他十余年间遍访战地遗址、萃取烽火记忆后亲手调制的色彩。这抹赭红也正是他的巨幅中国画《起来——义勇军战士造像》的灵魂底色。

从2012年起，王丹聚焦“辽西义勇军”主题，融合国画写意、魏碑书法、陶印篆刻、雕塑体量等诸艺，集中创作20余幅恢宏画作，把抗日义勇军英魂刻进历史丰碑。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我们走近这位艺术家，倾听他“笔墨铸烽火”背后的故事。

把英雄从史料里请出来，赋予温度

“最难不在技法，而在于如何让作品具有历史质感的同时，抵达超越具象的精神高度”

立秋后的画室内多了几分凉爽，迎面是一壁宣纸，墨气里浸润着辽西大地的厚重。王丹站在巨作前陷入沉思。画面上，3位战士顶天立地：左侧书生投笔从戎，衣袂间犹带墨香；中间壮士怒目握拳，青筋如铁；右侧将士蓄势待发，目光如炬。画幅左侧《起来！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字样铿锵，民族呐喊裹挟着血泪和力量喷薄而出。

“最难不在技法，而在于如何让作品具有历史质感的同时，抵达超越具象的精神高度。”回望“辽西义勇军”主题系列的创作之路，王丹坦言，这是他艺术生涯中最具挑战性的10年，“都说十年磨一剑，这幅笔墨铸就的艺术之剑是我献给辽西热土的答卷。”王丹说。

“我是锦州人，听着辽西义勇军的故事成长。”王丹说，“高鹏振是孕育《义勇军进行曲》精神源头的重要人物，也是我最崇敬的抗战英雄。我觉得我有责任沉潜深耕，拿出对得起这段历史的作品。”构思、起笔于2012年，完成于2014年的中国画《辽西义勇军战士造像》，是王丹对该题材的首次探索。画面疏朗留白，延续传统文人画的写意之风。细看题跋，一处笔法极不寻常：淡墨先写，墨迹未干，重墨复皴。一淡一重，相破相生，碑石的质感破纸而出。他用笔墨做招包，让战士的英魂从历史石面上立了起来。王丹说，最初的作品是先把英雄从史料里请出来，赋予血肉温度。2015年，该作品入选“写意中国”首届中国画水墨大展，于当年9月18日在辽宁美术馆展出，系该题材首登国家级平台。同年，锦州市东北抗日义勇军研究会邀约王丹为高鹏振的抗日词作书丹题字。这段溯源国歌精神源头的经历，为他日后以丹青铸碑注入了更强烈的使命感与艺术自觉。“当年只是一纸题字，谁也没想到，缘分会在多年后化作数十幅磅礴的红色丹青。”锦州市东北抗日义勇军研究会会长张忠深



中国画《起来——义勇军战士造像》。王 丹 作

有感触。“越了解辽西抗日义勇军队伍的事迹，越被深深打动。他们当中，有放下锄头的农民，有投笔从戎的学子，有绿林归正的豪杰。身份各异，却有着共同的信仰：这片土地，一寸也不能让给侵略者！烽火远去，但英魂留下的印记永远镌刻在山河之间，这更坚定了我用艺术为义勇军立传、为民族精神树碑的决心。”提起这段艺术征程的初衷，王丹如是说。自2015年深度研读抗日义勇军史料以来，王丹便立志以笔墨为刃、以金石为骨，完成“辽西抗日义勇军”主题系列创作。

从推倒重来之勇，到朱砂入掌之韧

“文人画的留白虽美，但托不住厚重的历史，必须走出创作舒适区”

王丹的工作室虎溪窑，地处北普陀山北麓、医巫闾山西缘。大地褶皱深处，封存着波澜壮阔的东北民间抗战史诗。画室墙上挂满老照片，斑驳影像诉说着山河破碎、军民抗争的峥嵘过往。暮色降临，王丹常凭窗远眺，烽火岁月在他心中不断翻涌。深耕乡土红色文脉多年，王丹对这段历史始终心怀敬畏。他深知，这是一条没有捷径可走的创作之路，每一笔都必须对得起那些英魂。

初涉此题材时，王丹沿袭传统文人画清雅范式，以淡墨留白、温润笔意写意抒情。2015年，王丹开始频繁踏访辽西义勇军抗战遗址，对“一寸山河一寸血”有了更深体悟，史料中的文字记载、模糊的黑白影像渐渐

“活”了起来。这场行走，彻底改变了他的创作心境与笔墨表达。“之前的画，太干净了。”王丹说，“但战场不是这样。硝烟呛嗓子，尘土糊眼睛，血渗进土里变成了黑色。文人画的留白虽然美，但托不住厚重的历史。”

反复审视后，王丹深刻自省，毅然推翻所有初稿，从零重构，确立了“沉、拙、厚、重”的创作基调。这一决定意味着要舍弃多年积累的文人画经验，从熟悉的艺术舒适区走向充满未知的探索。变化显而易见——三位战士并肩而立，战马入画，烽烟隐现，空间有了层次，叙事有了方向。更重要的是笔墨：篆刻的凌厉、陶印的朴拙、魏碑的方折，尽数涌入线条。温润的行笔化为刀刻斧劈般的苍劲顿挫，纹似浮雕隆起。墨色淡淡碰撞，层层积淀出雕塑般的体量感。题跋也变了，“起来！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直接写上纸面，笔势激荡。

王丹的跨界突破，一度引发业内“刻大于画”的争议，但他内心依然坚定——“诗书画印本是一体，固守单一范式才是桎梏。义勇军不是‘画’出来的，是‘刻’出来的。他们是在历史上留下名字的人。”

何种庄重肃穆的色彩，更适于书写苦难与抗争？这是王丹苦苦思索的一个问题。无数个深夜灯下，无数次调色，他将朱砂、赭石与浓墨反复融合，终于淬炼出独属辽西抗日义勇军的沉郁底色。既非鲜亮刺目的纯红，也非灰暗沉闷的浊色，而是一种从大地深处生长出来的、带着铁锈气息的赭红。王丹摊开手掌，掌心肌理里就浸润着这种赭

红，那是常年与朱砂为伴的印迹。那一刻，我们分明能够感受到历史透过笔墨传来的温度和质感。

画作无声，山河自有回响

“100年后也许没人记得我的名字，但希望站在这画前的人，能听见一声‘起来’”

2024年，巨幅国画《起来——辽西抗日义勇军战士造像》创作进入攻坚。王丹盛夏闭关两月，但凡气韵稍有偏差，他便推翻重绘，力求不留一丝遗憾。篆刻刀意、陶印朴拙、石窟体量、魏碑笔势四种艺术语言在此交融，形成独特的视觉图式，也成为国歌精神源头滚烫的艺术呈现。站在这幅画前，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喘不过气。满构图，顶天立地，赭红与墨黑交织。三位战士浑然一体，如群山耸立。画面左下角，一方压角章刻着“向死而生”。王丹为此印刻了七遍。前六遍都“太好看”，反而显得轻。第七遍，钝刀，不修边，崩就崩，残就残。按上去，整幅画“镇”住了。“这四个字，是辽西义勇军的精神写照。绝境奋起，以身赴国难，以骨续山河。”王丹的话里似有千斤重。

该作品在迎接第十四届全国美展暨辽宁优秀美术作品展中获中国画类优秀奖，并在辽河美术馆展出。画展上的一幕，让王丹长记于心。一个年轻人在画前驻足许久，不断用手背抹去眼角的泪。原来，画中壮士双拳紧握的神态，让他想起了爷爷的讲述，“听爷爷讲，他的三哥当年就是抗日义勇军的一员，血战殉国，双拳紧握，旁人用尽力气也无法掰开。”

“这便是我十年创作的全部意义，愿每位观画者都能触摸到永不熄灭的信仰火种。”王丹说。一幅画，让一个家族的伤痛与整个民族的记忆交汇，这便是艺术最深沉的力量。

作品面世后，国内美术界权威专家给予高度评价。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范迪安认为，作品跳出传统人物画叙事套路，融书法骨力、篆刻刀感、雕塑体量于丹青，立意深沉、气象雄阔。

“在所有表现辽西抗日义勇军题材的美术作品中，王丹这组十年沉潜之作，是最具艺术重量、最具语言独创、最具历史诚意的一套体系性创作，”中国国家画院著名画家赵奇评价，其最大突破是创造性运用了“纸上造碑”的艺术思维。“作品融合汉画像石、北朝碑刻古朴气韵，打通书画印陶多种艺术形式，构建全新创作范式。深挖辽西红色文脉，追溯国歌精神本源，实现传统笔墨与红色主题守正创新，是辽宁地域红色美术标杆之作。”辽宁省美术家协会主席王易竟这样点评。

听过讲述，再次站到画前，我们的感触更深了一层。那三面面孔，带着战火熏烤、尘土浸染的痕迹。王丹说：“我把自己当成他们中的第四个人——不是站在画外画，是站在他们中间，朝同一个方向看。”

他们看向的，是历史深处——1931年的辽西，炮火、家乡，一个民族必须闯过去的关。而我们看到的，是铭记与传承。王丹就这样以金石笔墨重构起辽西抗战记忆，“100年后，也许没人记得我的名字。但我希望站在这画前的人，能听见一声‘起来’。那不是从画里传出来的，是从他们骨头里响起来的。”

百件“压箱底”文物同框展出

沈阳故宫“高定”与孤品让你一次看个够

本报记者 刘海博 文并摄

8月11日，“典藏山河——沈阳故宫博物院建院百年百件文物展”在沈阳故宫文化博物馆（沈河区朝阳街131号）开展。此次展览精选100件（套）文物，涵盖书画、瓷器、玉器、织绣、漆器、古籍、玻璃器、珐琅器等多元门类，品类丰富、体系完备，多件国家一级文物集中亮相。其中，巨幅绘画、袖珍书和“限量版高定”都在展览中出现，一场跨越千年的文物盛宴缓缓铺开……

大画小书，各显其珍

本次展览最大看点之一就是多件国家一级文物密集陈列，可谓“国宝变批发”，让人目不暇接。

走进展厅，第一眼就会被沈铨的《丹凤朝阳图》抓住眼球，这幅画作长超3米，宽近1.7米，格外醒目。在这幅画旁，展示着王时敏《云谷乔松图》、王鉴《南山图》、郎世宁与唐岱合绘《松鹤图》，这4件文物均属国家一级文物，集中展出实属难得。

巨幅画作抓人眼球，“袖珍”宋版书同样宝贵。宋刻本古籍存世极少，自明清以来就有“一页宋版一两金”的说法，流传到今天的宋版书更是凤毛麟角。此次展览，展出了极为罕见的“宋巾箱本《礼记》”。

“巾箱本”是指中国古代开本极小、可置于装头巾小箱中的书籍。这本书高仅9.6厘米、宽6.8厘米，静静安放在展柜中，隔着玻



国家一级文物“明白釉玉壶春瓶”。

璃也能清晰地看到其十分小巧，好像可以放在手掌中，是古代学子在求学、游玩路上，为了追求轻便、随时翻阅而特意设计的。封面是黄色洒金绢质纸，保留了《天禄琳琅书目三编》的装帧，这样的“原装原套”十分难得；里面的字小巧规整，还有南宋光宗时期刻书避讳的特征。“在上世纪20年代溥仪赏赐给溥杰的书单中，就有这本书的身影。”沈阳故宫博物院展示交流部策展人林城涛说。

瓷器品类同样呈现着“有大有小”的一级文物。其中，“清乾隆款祭蓝釉活腰环葫芦大瓶”是宫廷陈设重器。它最大的工艺难

点在于葫芦腰身的环是可以转动的。由于环体是二次烧制，窑温稍有差池，就会把通体已经烧制好的祭蓝釉损坏，出现活环粘连、釉面脱落等问题，成品率极低。这一大瓶不但体量硕大，而且形制规整，可见清代御窑顶尖的烧制水准。

在大瓶的对比之下，不远处展出的“明白釉玉壶春瓶”更显小巧精美。同样为国家一级文物，这件器物是明代“甜白釉”的典型代表。当下古装剧中常常出现的“甜白釉”就是指这一品类。

“限量版高定”文物组团出街

本次展览还展出了一些古代的“限定版好物”，堪称当时的“高级定制”。

记者在展厅中看到一张“明崇禎款潞王制‘中和’琴”。“潞王”是明末藩王朱常滂，此人不重权势、专精雅艺，尤其精通音律制琴。他所创的“中和”琴，在清代文人笔记中颇负盛名，价值很高。

自崇祯中期至明末，朱常滂在藩国设立机构制琴，采取标准化与规范化流程，每年制作三四十张，每张古琴都拥有独立年份、专属编号，统一镌刻在琴背圆形龙池内侧，相当于专属编码。目前已知遗存潞王琴编号最早为崇祯六年（1633年）第一号，最高为第二百三十二号。这件文物上清晰雕刻着“大明崇祯己卯岁孟春潞国制一百九十八

号”字样，不禁让人遥望制作者的高超工艺和慧心巧思。“中和”琴纪年与编号明确，工艺精湛，对研究明代宫廷礼乐制度、内府物品管理及藩王文化具有重要价值。不过，“中和”琴是朱常滂监制，而非他亲手工制作。

展览中另一件“限量版”文物，不是指数量，而是指时间。四枚清代咸丰年间户部官票，也就是民间俗称的“银票”，流通不足十年。从展出的官票上，可以清晰地看到“壹”“伍”“拾”“伍拾”字样，对应的就是银两重量。据了解，当时共发行五种，还包括“叁两”。这些官票面额不同，尺寸也有所不同，但版式却是统一的。由于印发无度，户部官票缺乏足额准备金，发行后迅速贬值，从问世到彻底废止，流通时长不足十年。短暂的流通周期，让这类官票存世量少，留存品相完整的更是罕见。这四枚官票真实记录了清晚期财政体系的兴衰变化，是研究近代金融史的一手珍贵实物史料。

本次沈阳故宫百年文物展，不但有恢宏巨制、精巧古物、稀缺孤品，也让更多“隐藏”回沈阳故宫。1914年，11万多件藏品被迁往北平古物陈列所；1933年，部分藏品又随故宫文物南迁，辗转数地，现分藏于国内多家文博机构。本次展出的辽宁省博物馆“明清花缠枝花蒜头瓶”、承德避暑山庄博物院“青花五彩婴戏图碗”、镇江博物馆“清乾隆款青花花卉纹直颈瓷瓶”等文物皆曾收藏于沈阳故宫，在此次展览中重聚一堂。

艺言艺语 YIYANYIYU

从医巫闾山看交融

任海丁

今年5月，辽宁省博物馆举办“镇岳凝山海——医巫闾山辽代帝陵考古成果展”，展出200余件文物，均为辽宁北镇医巫闾山的显陵、乾陵及周边家族墓群出土。展览极有价值，不仅因为九成文物属于首次公开——如果把它同辽博2024年的“山河与共——辽金历史文化主题文物展”连起来看，那么本展就既能在物质层面、还能在历史发生角度相当细化地见证宋辽之际文化和合交融的进程。

如辽代才开始有的“单一兆域、多座帝陵”礼制，即多位皇帝葬于同一陵区及皇帝与帝后合葬一座陵墓中。如中原—契丹融合的建筑工艺，实则是目前国内发现最早的皇家琉璃瓦建筑群。另一个鲜明的例子是，镌刻有契丹小字与汉字的祭祀礼器“玉册”，是辽代采用中原礼仪形式的用玉明证。这些除反映契丹民族原特性外，又体现了一种文化和合性的认同。史学家钱穆认为，辽代本身即中华文明的分化。因为它和此前的渤海国相似，都是与中原文明的经济、文化相结合的城郭耕稼生活形态，而不似匈奴、突厥那样纯粹的游牧生存性格。所以五代末年著名的“礼乐归辽”事件，在长时间跨度上看，也是此一文化和合的历史表现。后晋遣使将中原全套礼乐仪仗送予辽太宗耶律德光，带来的直接结果是，从此辽代制度被汉唐以来的中原礼制正式地、系统地改变了，如典型的“南面”汉制与“北面”契丹旧俗的综合体制。这种文化和合的趋势不但深远地影响了之后的中国史，且正是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大主体凝聚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

值得提到的，还有帝陵台基围栏的“钩阑华板”雕刻，它在艺术风格上和北宋巩义皇陵石雕接近；二者均区别于唐代雕塑的强烈夸张，而转向静气内敛。这在艺术上，宋辽或者是同源的，至少是对汉唐艺术传统的同序发展。显陵所葬的东丹王耶律倍，就是一位艺术水平极高的画家。作为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长子、统领渤海国旧地的耶律倍，精于阴阳、音律、医药与汉辽文章，是一位沉浸于中原文化的皇族。他的汉名为李赞华，史载其擅长描绘人物鞍马，宋代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刘道醇《五代名画补遗》及《宣和画谱》对他都有过记录。传为他所画的《东丹王出行图》《射鹿图》等，足以跻身一流人物画之列。尤其《东丹王出行图》中的人物表像，刻画切实精微，后世宋代人物画家李公麟曾直接临摹并受其启发；而衣纹用线圆转柔劲，直追被誉为画圣晋代顾恺之的线条风格：所谓“神气飘然在烟霄之上”。可以说，李赞华的人物画，同时具备五代时新的写实风尚和中唐以后对汉晋艺术的复古格调——这也正是宋代绘画艺术的出发点和发展趋向。就对绘画发展的重视而言，辽宋几乎一致。辽代亦设有翰林图画院，赞助指导绘画活动。辽兴宗耶律宗真自己便喜画鹿，史载他将自己所作五幅组画《千角鹿图》献与宋仁宗；而宋仁宗把他自己张挂在天清楼并召集大臣共赏，成为一时美谈。

说回展览内容，另有成就斐然的考古学方法的展示，像使用ArcGIS技术计算帝陵原始祭祀路线，最终确定了显、乾二陵的准确位置等。但最令人深思回味的，还是帝陵营造及出土文物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见证作用。其中展现出的文化和合交融特性，正如史学家吕思勉所说的互相淬砺而光景常新，所以能够“经过长久的时间，养成极坚强的民族性，而形成伟大的民族”。

本栏目由辽宁日报、辽宁省文艺评论家协会联合主办

206件中原文物亮相辽博

本报讯 记者朱忠鹤报道 由辽宁省博物馆、河南博物院联合主办，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协办的“星起河洛——夏商周中原礼乐文化特展”日前在辽博启幕，展期持续至10月31日。本次展览共展出文物206件（组），全程免费开放，无需预约即可观展。

河洛地区是先民勘定的“天下之中”，也是夏商周王朝核心腹地、“中国”文明概念萌发之地。夏商周是早期国家与礼乐文明成型的关键阶段，三代更迭推动礼乐文明完成从祭祀仪式到国家治理智慧的升华，本次展出的中原出土文物，完整见证了这一文明演进脉络。

展览分为两大板块，第一部分“礼乐肇兴——祀神与王权”下设两大单元，梳理夏商礼制奠基历程。礼萌芽于原始祭祀，夏代形成礼制雏形，商代青铜礼器成为王权象征，甲骨卜辞“妇好”鸟足鼎、兽面纹方鼎等文物，展现彼时“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社会图景。

第二部分“礼乐斯盛——秩序与德治”包含三个单元，呈现周代礼乐成熟风貌。周公制礼作乐后，以鼎簋、编钟、玉组佩列分尊卑等级，构建德治社会。现场陈列蟠螭纹编钟、多瑞玉组佩、王子午鼎、玉阴阳人等重器，直观展现西周有序崇德的社会面貌。即便东周出现“礼崩乐坏”，礼乐文化的内核仍持续传承革新。

从夏代陶礼器到商周青铜重器、玉礼器，206件（组）文物串联起三千余年文明史诗，以器物为载体，向观众诉说古代先民的信仰、权力秩序与君子德行。